

著 民樸張

傳評家大八宋唐

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

27 苑書生學

臺灣學書局印行

學生書苑 27

張樸民著

唐宋八大家評傳

27 苑 書 生 學

傳評家大八宋唐

唐宋八大家評傳

著 者：張

樸

民

出 版 者：臺

灣

學 生

書

局

代 表 人：馮

愛

羣

發 行 者：臺

灣

學 生

書

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

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

電話：三二一〇九七・三四三四六七

定價新臺幣

精裝六〇元
平裝三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印行

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爲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八四號

自序

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唐宋兩代的復古運動，對於中國文學的改革，實具有深遠之影響，宋代之復古運動，可謂爲唐代復古運動的延續，又可謂爲唐代復古運動之復興，良以晚唐五代，復古運動業已消沉，宋初始又抬頭並漸趨復興，其於文風之丕變，較諸唐代尤有過之，復古運動的先驅者：隋唐有李諤、王通、柳冕諸人，宋代有柳開、趙湘、石介、穆修諸人，由於當時駢文麗辭方興未艾，兼以彼輩自身力有未逮，所以雖各竭力以赴，亦未能奏其膚功，故僅有些微消極的破壞，而乏積極顯著的建設。

洎乎唐代之韓愈、柳宗元，宋代之歐陽修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、曾鞏、王安石諸家出而領導；再以其門人弟子，四方景從推波助瀾，其師友輩復從而羽翼之，此呼彼應互相標榜；復古運動始漸收指臂之效。故而唐宋八大家在復古運動中，得佔主要的地位，且各有其特殊的貢獻。自明季以來數百年間，遂號稱「唐宋八大家」，並確立其千秋不移之地位，而永爲世之學者所宗。關於八大家的生平事迹學術文論，不但載在唐宋正史，有關專著亦汗牛充棟洋洋大觀，他們的傳奇故事流風餘韻，甚至稗官野史小說唱本，亦有流傳，均可謂爲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人物，足徵八大家對後世的影響重大，已爲不爭的事實。

唐宋八大家的傳記，歷代以來撰著雖多，惟均係個別撰寫，彙八大家於一總者，迄今尙付闕如，以唐代之韓柳二家並稱，於復古運動則併駕齊驅，相輔相成；宋代之六家，歐陽修爲其首領，三蘇、及曾鞏、王安石亦師友之間，因爲他們一生的志業多互有關聯，所以更加錯綜複雜，傳其一家已覺千頭萬緒，總述八家將益感經緯萬端。筆者多年來於大專講授國文，選自八大家之題材甚繁，因多方蒐集資料，互相參酌考證；並不斷補充以求完整，因萌撰著八大家合傳之志，惟以茲事體大，遲遲未敢着手，邇來偶或瀏覽坊間有關八大家之刊籍，或僅重於文學批評，學術氣味過濃，令人讀之有艱澀枯燥之感，或則過分流於通俗，予以演義平話之譏，或叙而不評，或評而不述；致欲瞭解八大家之事實者，不能得其要領，筆者有鑒及此，故不揣譌陋，而有本書之撰著。

本書儘量以深入淺出之筆法，取材則折衷於學術與平易之間，考證務期嚴謹而翔實，篇幅亦力求精簡而連貫，篇首特加緒言，略述唐宋以前中國文學之源流及其嬗變，俾讀者對唐宋兩代復古運動之前因後果，先有一明晰之概念，再進而窺知唐宋八大家不同的風貌，抑尤有進者，我們應體認中國文化基礎深厚，歷久彌新；所謂復古運動，亦並非一味模仿古人之章句，而是欲以平實無華之散文，代替華靡無物的文體，在固有的基礎上，不斷的創新，方期中國語文永遠進步，以適應時代的要求。值此勵行復興中華文化之際，我們對古典文學尤須努力發揚；以培養學子欣賞的能力，而增加語文的功用及效果，何況我們現代的散文，實

亦由古文逐漸演變而來，爲了追本溯源繼往開來，更不能不重視古文了。

關於唐宋八大家的資料，浩如烟海，因而本書取材掛一漏萬之處，仍恐所在良多；且魯魚亥豕亦在所難免，尙祈海內外碩彥有以教正，則不勝馨香以禱。

張 樸 氏謹識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於石門

唐宋八大家評傳

目次

一、緒言——唐宋以前中國文學之嬗變·····	一
二、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·····	四七
三、思想深湛的柳宗元·····	六三
四、宋代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·····	七五
五、懷才不遇的蘇老泉·····	八九
六、一生坎坷的蘇東坡·····	一〇三
七、願濱遺老蘇子由·····	一一九
八、桐城派古文宗師曾南豐·····	一三一
九、變法失敗的古文家王安石·····	一四一
附錄：本書重要參考書目錄	

緒言——唐宋以前中國文學之嬗變

一、中國文學的起源

中國文學的發展，最早應溯源於殷商時代，因為經考古學家與古史學家的研究，雖然傳說黃帝命左史倉頡造字，但是否有倉頡其人？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人？至今尚沒有定論。中國

自商朝始有文字的記錄，這由清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甲骨文，那些龜甲獸骨上所刻的卜辭書契等便可證明，甲骨上所刻的古體文字，雖然大部份都是卜辭書契，但已成爲以文字表達情意，記載事物的開端，也可以說是中國最原始的文學。

安陽殷墟所發現的甲骨文，大部份都是象形文字，這與世界各民族的原始文字一樣。古代人類的智慧簡單，他們生活環境無不受大自然的影響。他們觀察自然的形象：日月星辰、山川雨露、鳥獸蟲魚等，創造了象形文字。最早在象形文字外，甚至以結繩代替文字，原始文字不過是文字的雛型，筆劃或左或右，有正有反，沒有固定的型式，人們用以表達情意，當然顯得拙劣簡單，可是在那個時期，能有如此頭腦已屬不易了。

我們都知道詩是中國文學的濫觴，而詩又是從歌謠中演變而成的；但歌謠的出現，有的在文字形成之前，有的在文字形成之後，因為沒有文字之前已經有了歌謠，所謂歌謠乃是人類勞動生活與自然環境的反映。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時代，人類體力勞動無意中發出的歌聲。何況七情六慾是人類的天性，氏族社會的生活簡單，人與人的接觸雖然不多；也照樣可以流露出悲歡離合，兩情相悅的感情，這些都要靠歌謠來表達，自從有了文字之後，有些歌謠便成爲詩篇。

我國最早以文字寫成的詩歌，至今流傳下來的，在三代以前，相傳有葛天氏樂歌八闕佚存的一句、伊耆氏蠟祭辭四句、黃帝時的斷竹歌二句、唐堯時有擊壤歌、康衢謠、大唐歌、

虞舜時有南風歌、股肱元首歌、卿雲歌、八百贊歌、載歌等。這許多詩篇經後人考據，都是假托和偽造的，因為最早用文字寫成的詩歌，其時間必定要比傳說為晚。而五經之一的詩經，則可謂為中國最早用文字寫成的第一部詩集，亦就是中國文學的真正起源，詩經中最早是商代的詩，但篇數極少，到了周代詩歌方逐漸發展起來，而且創作亦漸增多，經孔子刪訂後，僅留下所謂詩三百篇了。

詩是什麼？釋名說：「詩，之也，志之所之也。」樂記說：「詩，言其志也。」文心雕龍說：「詩者，持也，持人性情。」這都和毛詩序所說的「在內為志，發言為詩」意思相同。所謂志，實在包括了思想和感情，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，也是最早的文學作品；詩經所代表的大約有五百多年時間，而且是從許多人和許多部落的作品中逐漸輯成的，因為詩經不僅蘊蓄了很多倫理思想；而且包含了為政之道，天子為了勤求民隱察風觀俗，特設采詩之官，五年一巡守，並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，足見詩與政治，已發生了密切的關聯。

春秋戰國時代，由於周朝王室的衰微，天下諸侯強凌弱衆暴寡；不斷的互相兼併，舊的貴族逐漸沒落，同時因商業日益發達，平民得以乘時而起，一般遊俠說客以及所謂縱橫家，各以其所長，顯揚於諸侯之間；又加以平民已有受教育的機會，所以人才輩出，以致諸子百家爭鳴，極一時之盛，文學已不是宮庭和貴族的專利品，整個的社會起了劇烈的變化，無論政治的主張，學術的立論，都不是短短的詩篇所能容納的，因之記載諸侯的興亡議，論政治

的得失，標榜學術的思想，都有賴於新興的散文來代替了。

二、散文與楚辭的產生

中國最初的散文乃是「史」，因為史是一種記事文，「史」原來是記事的官職，後人因把他們所記的事也稱之為「史」，傳說遠在黃帝時代便有史官，黃帝命倉頡為左史，沮誦為右史，左史記言右史記行，就是「史」的開始，及至周代為適應時代的需要，文字已漸漸的增多，史官的記載亦分門別類漸趨繁雜，所以又分為內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、太史、小史等名目，各有專司，所記亦不同。春秋戰國時代，連諸侯也都各自設立史官，因為記載的事物多了，散文也因而發達起來。孔子嘗取三代史官所記刪為尚書，又依魯國史記作春秋，前者為記言後者為記事。此外如左丘明所作的國語、左傳，不但是史書也是很好的散文，其文字內容雖嫌簡短，但能運用流利的語句，將複雜的事物，很技巧的表達出來。戰國策雖係漢代的劉向蒐集而成，而其中的作者，均係戰國時代的人，不過均已佚名而已。戰國策記述縱橫捭闔詭譎傾軋之事，如蘇秦之合縱，張儀之連橫，范雎之相秦，魯連之解紛，鄒忌之幽默，淳于髡之諷刺；匪但修辭美妙，描寫亦非常生動，真可說是繪聲繪影，栩栩如生。春秋戰國時代的散文，最早是老子和論語這兩部書，但都不是老子、孔子的著述，而是與門人以及

他人的對話，由弟子記述而成；都是簡約的文體，雖然每個篇章不過寥寥數語，已足發人深省，但片片斷斷沒有連貫性，正是散文發展的萌芽。

其他諸子中之最著者，如：墨子、管子、莊子、列子、公孫龍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子思、韓非子、鬼谷子、孫子、吳子等，無論談人生哲理、政治哲學、講兵法以及工農醫卜星象者；或有所師承加以闡揚，或爲其獨創自成一家之言，無論說理、論辯、記述、描摹，都是優美的散文，在發展的過程中，可以說是由歷史的散文，演進到哲學的散文。其中墨子最講究方法，也就是根據方法論以研判問題，然後再找出結論，以嚴謹有條理的方法，應用到論辯上，這便是中國最早的「名學」，也就是歐洲的「邏輯」和印度的「因明」；其他如惠施好辯及取譬，主張「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，而使人知之。」和公孫龍子的堅白之辯，與白馬非馬之辯；都是由推論、歸納到結論，正如今日之所謂科學方法。孟子雖然倡仁義，法先王，反楊墨，鄙縱橫，但他的文采佳氣勢盛，仍脫不了許多論辯。孟子曾說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不得已也。」足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，非但以言辭爭辯，同時亦以文章爭勝，爲了維護自己的主張也不得不辯，這不是今人所謂真理愈辯愈明嗎？

在此一時期北方散文盛行的時候，南方產生一種新型的文學，便是楚辭，所謂楚辭，是由楚地民歌變出來的；因爲楚辭之創始者屈原、宋玉、景差所作的諸騷，「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，故謂之楚辭。」因而楚辭可說是楚地的詩歌。後來的古詩，受楚辭

的影響亦逐漸轉變，最顯著的是由四言正格變成長短句，由短篇變為雄偉的長篇。至於賦則來源於楚辭，有人把賦當作辭，因為辭可以歌，古詩僅有節章句好似韻文；賦則不能歌，僅能誦，故與辭不同，但清朝姚鼐所編的古文辭類纂，則併稱為辭賦。

三、秦漢文學的發展

秦始皇所以能滅六國廢封建統一天下，都得力於法家思想的政治統治；自秦孝公時代，已採取了法家的治術，由於荀子、商鞅、韓非、李斯等人，先後的倡導或當政，使法家功利主義的思想，非但能一一見諸於現實政治，而且亦影響到文學方面。由於法家所主張的嚴刑峻法，再加上秦代的暴虐政治，因箝制人民的思想，也妨礙了文學的發展。秦代自始皇到子嬰，不過三十多年的時間，祚命極其短促，在文學方面，雖無重大的發展，然而卻產生了賦。荀子是第一個作賦的人，他是趙國人，史記上曾記載趙氏之先與秦共祖，何況鹽鐵論、毀學篇尚謂李斯為宰相時，荀子還在世上，所以荀子也算作秦國人。荀子名況，以孔學為本，復衡量當時社會政治之需要，對孔子學說加以補充，建立了新儒學。因此他無論為文與作賦，都不是為文學而藝術，而是要發揚功利與倫理，他雖久居楚國，但並未受楚辭的影響，他承受北方文學的系統，傾向法家的思想。李斯生長於楚國上蔡，久受南方文學的薰陶，所以頗有文采；他先從荀况學帝王術，原想在楚國有所作為，因默察當時天下的情勢，唯有秦國

始有統一戰國七雄的力量，因而到秦國投効呂不韋，終於成爲秦國的宰相。試看他的諫逐客書，文章技巧非常高妙，堪稱秦代散文的代表作，他所作的銘，如：泰山、瑯琊臺、之罘、東觀、碣石、會稽等篇；雖然盡是歌功頌德，但是氣魄都很浩大。漢劉勰曾評稱：「法家辭氣，體乏泓潤，然疎而能壯，亦彼時之絕采也。」如此看來，李斯可謂秦代真正的文學家兼政治家。他又把詔命改稱「制」，把臣下呈上的文書定名爲「奏」，也算是一種文體的創造。秦代另有韓非，他與李斯同學於荀況；他們兩人崇尚功利的法家思想相同，而且比荀子更激進，荀子還是半儒半法融合一體，李斯與韓非可以說是純粹的法家。至於商鞅本是衛國人，在本國不得用，投效秦孝公終於拜相；使秦國變法圖強，他所作的薄六鹵，與韓非的非五蠹，都充分表露極端的法家思想；因而秦代的焚書坑儒蔑視古典，使正在發展中的文學，遭受了空前的厄運。

自漢高祖以平民崛起山澤，取秦而代之，建立空前統一的大帝國後；除了呂后專政和王莽篡位的一段時間外，漢祚延續四百多年，造成中國歷史上空前極盛的時期，舉凡秦代所未實現的建國計劃，漢代都一一付諸實施，且規模宏偉尤有過之。漢初的文學因爲距秦代不久，春秋戰國的文學流風猶存，所以在秦代被壓抑的文學，不久就昌熾起來。在高祖時代楚人賈陸，以客從高祖定天下，以秦所失漢所以得之者，著存亡之徵十二篇奏之高祖，高祖無不稱善，號其書曰新語；文帝時之賈誼，不但能文且擅辭賦，著有新書五十八篇。賈長沙集輯本

一卷並傳於世，文帝時之鼂錯，爲太子家令，以其能言善辯深得太子之倚重，號爲智囊；曾於文帝時對策三十餘篇名爲漢策，文帝奇其才拜爲中大夫，鼂錯之文精悍茂密，其學之博堪與賈誼相媲美。司馬相如於景帝時爲武騎常侍，雅好辭賦，爲官非其所願；客遊梁時作子虛賦，武帝閱之大爲贊賞，遂召入爲作上林賦，繼又獻大人賦，武帝拜爲郎，陳皇后失寵，別在長門宮，以黃金百斤托相如作長門賦，終感悟武帝。武帝本人亦雅好文學，所作悼李夫人賦，詞采甚美，又好新聲，立樂府，命李延年司之，命司馬相如造郊祀歌十九章，五言七言詩就此發源。又有東方朔著答客難、非有先生論、十洲記、神異經，滑稽詼諧，寓意深遠，有俳優文學家之稱。司馬遷則以歷史散文馳名，父親司馬談爲太史令，司馬遷繼父爲太史令並繼父志著史記，因盛稱李陵之才，並爲李陵降匈奴而辯誣，觸武帝之怒而受腐刑，在獄中發憤著述史記一百三十卷，上起陶唐下至武帝獲白麟止，修辭優美，文氣雄偉，不特後世史家仿其體例，散文也受其影響。董仲舒於景帝時爲博士，武帝屢次召對策甚爲器重，少治春秋著有春秋繁露。劉向曾作列女傳八篇，並著新序，說苑五十篇，賦三十三篇。楊雄仿易作太玄，仿論語作法言，仿離騷及司馬相如之賦作四賦；世以楊雄之文，多出模擬，頗加非議，當時模擬成風，亦未可厚非，況楊雄之文自有其價值。成帝時劉向之子劉歆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，爲目錄學之鼻祖；他於治易及校秘書時，見春秋左氏傳大好之，遂引傳文以解經，由是章句義理之學大備。至昭帝時文學雖漸衰，而桓寬的鹽鐵論則甚爲出色，且流傳亦廣。

東漢明帝和帝時代的班固，是史學家兼文學家，因為他不但擅作賦，散文亦極優美，所作的漢書，足與西漢時代司馬遷的史記相媲美；其兄是投筆從戎，遠播大漢聲威的班超，妹是世稱曹大家的女文學家班昭，也是史賦兼擅，班固坐罪冤死獄中，班昭繼兄遺志，完成漢書八表及天文志。與班固同時齊名的還有張衡，亦在漢代文學佔有重要的地位；他的同聲歌、四愁詩，成為五七言詩創造期中的代表作，同時他具有高尚的人格與科學思想，他曾發明渾天儀以觀測天象，造候風地動儀，以測驗地震之方向。

西漢的文學作家，多為皇帝所御用，或於宮庭中專事為皇帝吟詠歌誦，故有宮庭文學之稱。東漢中葉以後，由於宦官外戚的爭權，外侮日亟，內亂頻仍，國勢日益衰頹，社會亦顯出動盪不安，因而文學的思想與創作，亦顯然發生了變化。如張衡的歸田與鬻牖，都是以平淡簡煉的語句，發抒自己的胸懷，表達人生的理想，一掃舊日宮庭文學專事鋪陳摛文堆砌的文風。此外因佛教自明帝時傳入中國，日盛一日，佛教思想不但被一些帝王所接受，更深入民間逐漸生根，因而文學的思想與創作，無形之中也受了佛教的影響。

到了漢代末季獻帝建安年間，由於曹氏父子的提倡，一時人文薈萃，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等七人的文采驚人，為世所宗，有建安七子之稱。曹丕於典論論文中謂：「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；咸自以騁驥驟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併馳。」又謂：「王粲長於辭賦，徐幹時有齊氣，然粲之匹也，如粲之初征、登樓、槐賦、征思；幹之

玄猿、漏卮、圓扇、橘賦，雖張蔡不過也，然於他文未能稱是。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，應瑒和而不壯，劉楨壯而不密，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，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，以至乎雜以嘲戲，及其所善楊班儔也。」曹丕自小就能文，而且才氣縱橫；以建安七子各有所長，亦各有所短，分別加以客觀的批評，態度至爲允當，堪爲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張本。同時曹丕又力主「蓋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尙實，詩賦欲麗。」更指出各種文體的寫作方法與態度；事實上他這種見解，亦恰能符合當時的要求。

曹操雄才大略一代梟雄，然而他雅好詞章，收攬英才獎勵文學，一時天下英才，幾乎全爲他網羅，他雖陰險奸詐，但爲文則風流閒雅，與諸子鞍馬間爲文，又往往橫槊賦詩，如短歌行：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；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，何以解憂？惟有杜康。……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；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」多麼雋永，又何等豪邁。曹植爲曹操之第三子，曹丕之弟；年十歲即讀詩書論及辭賦數十萬言，善屬文且能詩，曹丕即帝位忌其才，十二年間三徙其封地，並以七步詩逼之，年僅四十一歲即鬱鬱而死。他的詩慷慨雋逸，活潑清新，鍾嶸稱其：「骨氣奇高，詞彩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，粲溢古今，卓爾不羣。」謝靈運甚至說天下才共一石，陳思王才高八斗，即今譽人所謂「才高八斗」者。曹植在建安諸子間允稱獨步，著有詩賦頌銘百餘篇，今有曹子建集十卷傳於世。曹植生死之交的密友楊修，詩賦碑頌無所不擅，不但文思